

罗宗强文集

明代文学思想史

下 册

非外借

中华书局

罗宗强文集

明代文学思想史

下 册

中华书局

第十一章 文学复古思潮的再起

嘉靖后期,在文学思想多元化的环境中,再次出现了文学复古之思潮。李攀龙、王世贞、谢榛、徐中行、吴国伦、宗臣、梁有誉为此一思潮之发起者,习惯称之为后七子^①。此一思潮之流播,

① 宗臣《再报张范中》称:“若临清谢山人榛、济南李郎中攀龙、湖州徐比部中行、南海梁比部有誉、吴人王比部世贞、楚人吴舍人国伦,数子者,皆海内一时艺林之极隼也。仆亦得以奉陪末论,共励斯盟。”宗臣所说,是嘉靖三十二年之前的情形。三十二年之后,攀龙与谢榛产生分歧,世贞等右攀龙而排谢榛。此后,世贞与国伦只提六子,不提谢榛。世贞《五子篇》,提及攀龙、中行、有誉、国伦、宗臣,加上他自己,共六人。在《长兴哭子与,归途即事有感》中说“当年六子五沉沦”,亦排谢榛于外。国伦《哭李于鳞宪长》六首“当年结社五君同”,加上他自己,也是六人。王世贞后来为徐中行写墓志,回忆当年七子结交情形,也有意将谢榛排除在外。六子与谢榛的矛盾,固有文学观念之不同;但更多的是华裾与布衣感情之隔阂。李攀龙们在感情上看不起谢榛。其时徐渭已看到这一点,并为之不平。他在《廿八日雪》中为此愤慨不已:“谢榛既与为友朋,何事诗中显相骂?乃知朱毂华裾子,鱼肉布衣无顾忌。即令此辈忤谢榛,谢榛敢骂此辈未?回思世事发指冠,令我不酒亦不寒。”(《徐渭集》页143,中华书局1983年版)李庆立《一时七子集华躅,清韵珍珍萃凤池——明“后七子”结社考》(见其论文集《谢榛研究》,齐鲁书社1993年版)有详细考述,可参阅。

从嘉靖三十一年攀龙正式提出复古问题,至万历十八年王世贞逝世,近四十时间。攀龙正式提出复古问题的嘉靖三十一年,文征明 83 岁,杨慎 66 岁,归有光 46 岁,唐顺之 46 岁,王慎中 44 岁,茅坤 41 岁。杨慎的多元文学思想,文征明为首的江南文风,王慎中、唐顺之的宗唐宋文学思想影响尚在。而万历九年,屠隆《由拳集》刊行,屠隆在青浦县令任上写的许多诗,都已经充分显示出重个性、重直抒情怀的创作倾向,与复古思潮异样。这是说,复古思潮流播的这近四十年间,也是诸种文学思想交汇的时期。当然,复古思潮在这一交汇中处于主流地位。

第一节 文学复古思潮再起之因由

嘉靖二十六年,谢榛与李攀龙、李先芳等一起赋诗、论诗。二十八年谢榛与攀龙、世贞月下论诗,已涉宗唐问题。三十一年攀龙在《送王元美序》中,对世贞说:“仆愿居前先揭旗鼓,必得所欲,与左氏、司马千载而比肩。”^①此事也见于世贞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七十一《王氏金虎集序》。可知,嘉靖三十一年攀龙正式揭复古之旗鼓,提出学习左氏、司马迁的问题。我们可以把这一年,看作文学复古思潮再起之时。

^①包敬第标校《沧溟先生集》卷十六,页 395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,标点时有不同,个别文字据隆庆刊本改。

李攀龙(1514—1570)^①《送王元美序》已涉及文学复古思潮再起之原因:

今之文章,如晋江、毘陵二三君子,岂不亦家传户诵?而持论太过,动伤气格,惮于修辞,理胜相掩。彼岂以左丘明所载为皆侏离之语,而司马迁叙事不近人情乎?……后生学士,乃唯众耳是寄,至不能自发一识,浮沉艺苑,真为相舍,遂令古之作者谓千载无知己。

……吴越渺兵火,诗书藏于圜圜,即后生学士,无不操染;然滥竿不可区别,超乘而上,是为难耳。^②

在这段言说里,他批评其时之两种文风:一是以王慎中、唐顺之为首的推崇唐宋,主要是宗宋的文风。晋江、毘陵,指王慎中、唐顺之。攀龙认为,王、唐他们过于重视“理”而不重视修辞。后生学士一味盲目跟随他们,没有主见。一是批评吴中文风。

对此两种文风的批评,王世贞也有相同之论述。《赠俞山人允文》:

① 李攀龙,字于鳞,号沧溟,历下人。嘉靖二十三年登进士第,赐同进士出身;观政吏部文选司;二十六年,授刑部广东司主事;二十九年,升员外郎;三十年,升刑部山西司郎中;三十二年,出为顺德知府;三十五年升陕西按察司副使,提调学校;翌年求辞陕西按察司副使归乡。自此里居,至隆庆元年冬赴浙江按察司副使任。二年,升浙江布政司左参政。旋升河南按察使。三年,母死,扶丧归里。隆庆四年卒于家,享年五十七。有《沧溟先生集》等。

② 李攀龙《李攀龙集》李伯齐校点本,卷十六,页390—391,齐鲁书社1993年版。

长沙、新建，据高收广，挟声起听，号为霸儒。逮迓晋江、毘陵欵起创立，耳观之辈，蝇袭若狂。五鹿岳岳，畴能折角哉！仆每心语，未尝不扼腕发噫也。^①

长沙，李东阳；新建，王阳明。世贞称他们为“霸儒”。一是台阁重臣，一是心学领袖。他们都门人众多。世贞在这里没有明确提及他们的文学，对他们之不满，大概就其左右舆论之声势而言。而对王慎中、唐顺之的不满，则明显地就其宗宋文风之巨大影响言。《赠李于鳞序》说李攀龙所肯定的是李梦阳、何景明、徐祯卿，“而其微辞多讥切某郡某郡二君子。二君子固螭伏林野，其声方握柄，所褒诛足浮沉天下士。而其徒某某诸贵人，日相与尊明其道”^②。“某郡某郡”指晋江、毘陵；“二君子”指王慎中、唐顺之。攀龙所讥切的就是其时影响巨大、从之者众的王、唐二人。世贞在给王文禄的信中，论明文的发展，也涉及他们所要反对的文风问题：

国初诸公，承元习一变也，其才雄，其学博，其失冗而易。东里再变之，稍有则矣，旨则浅，质则薄。献吉三变之，复古矣，其流弊蹈而使人厌。勉之诸公四变而六朝，其情辞丽矣，其失靡而浮。晋江诸公又变之为欧、曾，近实矣，其失衍而卑。故国初之业，潜溪为冠，乌伤称辅。台阁之体，东里辟源，长沙导流。先秦之则，北地反正，历下造玄。理学

①《弇州四部稿》卷十三。

②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五十七。

之逃,新建造基,晋江、昆陵藻悦。六朝之华,昌谷示委,勉之泛澜,如是而已。^①

他这里论述了明文发展的五次变化,及其代表人物宋濂、王祿、杨士奇、李东阳、李梦阳、边贡、黄省曾、王慎中、唐顺之、徐祯卿。他提到王阳明,认为他是王慎中、唐顺之文学主张的思想基础。他认为崇尚六朝文风是由徐祯卿发其源,而黄省曾加以发展而已。他理出了这五次变化的线索,他认为五次都有缺点。明初是冗而易,冗,平庸;易,浅显。杨士奇、李东阳浅薄。李梦阳复古,回到先秦的准则,他当然给了肯定;但是梦阳辈的跟随者模拟的流弊使人厌恶。他又认为,江南的靡丽文风由徐祯卿启示,黄省曾发扬起来的。他认为,王慎中、唐顺之学宋人欧阳修、曾巩,失之于衍与卑。衍,繁;卑,卑俗。李东阳以前的文风,已成过去。世贞、攀龙们要面对的是江南文风的靡丽;王慎中、唐顺之学宋文风的繁杂与卑俗;与前七子追随者模拟之风的流弊。他们所要反对的,就是这三种文风。

对于明诗的发展,世贞也有论述。他认为,明初代表诗人是高启和刘基,“才情之美,无过季迪;声气之雄,次及伯温”。成化、弘治之际,“颇有俊民,稍见一斑,号为巨擘。然趣不及古”。于是李梦阳他们起而提倡复古:“敦古昉自建安,挹华止于三谢,长歌取材李、杜,近体定轨开元,一扫叔季之风,遂窥正始之途。”但是复古思潮起来之后,模拟剽窃之风盛行,于是又有起

^①《答王贡士文祿》,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一百二十七。此则文字又见于《艺苑卮言》卷五,文字略有不同。

而反对者,诗风又一变:“以故嘉靖之季,尚辞者酝风云而成月露,存理者扶感遇而敝咏怀,喜华者敷藻于景龙,畏深者信情于元和,亦自斐然,不妨名世。第感遇无文,月露无质,景龙之境既狭,元和之蹊太广,浸淫诸派,溷为下流。”他认为诗风又到了该改革的时候。于是李攀龙出来,提倡复古:“中兴之功,则济南为大矣。”^①和文风同步,诗风的发展同样面临三个问题:一是李梦阳们追随者模拟之弊,一是诗学六朝的“尚辞者”,一是王慎中、唐顺之们的“存理者”。世贞他们要反对的就是这三者。

世贞对其时之文风表现了极大的不满。他在给汪道昆的信中说:“以为世人方蝇袭庐陵、南丰之遗;不则亦江、庾家残滓耳。”^②明确指向学宋和学六朝之风。在给攀龙的信中,他贬抑吴中文人,说:“吴下诸蒙,政若八百人俱迷阴陵道者。然一俞允文能熟建安以上诗,便许仆以天下士,知否?”这是说,吴中文士,都不懂得建安诗的好处,只有俞允文一人懂得,因之世贞以之为知音。又说:“吴下诸生,则人人好褒扬其前辈。燥发所见,此等便足衣食志满矣,亡与语汉以上者。其人与晋江、昆陵固殊趣。然均之能大骂献吉云:‘献吉何能为?太史公、少陵氏为渠剽掠尽,一盗侠耳。’仆恚甚,乃又笑之,不与辨。”^③在《玄峰先生诗集序》中,他借着对章道华的诗的赞美,贬吴中诗风:“吴中诸能诗者,雅好靡丽,争傅色;而君独尚气。肤立,而君独尚骨。务谐好,而君独尚裁。吴中诗即高者剽齐、梁,而下者不免

①《艺苑卮言》卷五,周维德集校《全明诗话》页1933、1934,齐鲁书社2005年版。

②《答汪伯玉》,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一百十八。

③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一百十七。

长庆以后；而君独称开元、大历。”^①《李氏山藏集序》说：“某吴人也，少尝从吴中人论诗，既而厌之。夫其巧倩妖睥，倚间而望欢者，自视宁下南威夷光哉！然亦亡奈乎客之浣其质而睨之也。”^②

第二次文学复古思潮之起因，就是要反对上面提到的三种文风，是文风革新问题。

而在反对上述三种文风，提出复古问题时，带着张扬自我，互相标榜、争名位的浓重色彩。从复古主要骨干的文集里，我们可以找到他们互相标榜的大量言说。世贞有时比攀龙于李白，有时比攀龙于屈原，有时又说自己与攀龙“即古所著屈、宋，苏、李，扬、马，甫、白之俦”^③。攀龙称世贞为凤：“有凤衔灵文，栖栖北海湄。临流理羽毛，五采以自奇。”^④世贞就说攀龙为龙，“故人知未驯龙性，小弟凭谁与凤毛”^⑤。宗臣说攀龙与世贞，好比龙凤。世贞就写信给他，说宗臣是知音：“早夜韦弦之佩，以嘉承君之大贶，抑世贞有言，向者吾与足下僇力矫志，寔左右济南，以启不朽。龙凤之喻，中心藏之。”^⑥所谓“中心藏之”，实有感念不忘之意。世贞在给吴国伦的信中，说：

于鳞再发关中书，大赏仆诗，以为秦汉来二三千年，仅

①《弇州四部稿》卷六十六。

②《弇州四部稿》卷六十四。

③《李于鳞》，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一百十七，页94。

④李攀龙《送元美》二首之一，《李攀龙集》卷四，页89。

⑤《于鳞有重寄余兄弟作，再答》，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三十七。

⑥《与宗子相书》，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一百十九。

见此物耳。知言哉！^①

“知言”，知音，意谓自己的诗确实是二三千年来所仅见。世贞也吹捧攀龙，说他的《太华山记》为“千古第一记”^②。徐中行《重刻李沧溟先生集序》：“自汉而下千五百余年，擅不朽之业以明当日之盛，孰如于鳞者？所成不既多乎哉！”^③他们既互相标榜，又相互争名。世贞奉攀龙为领袖，而其实内心并不服。两人之间，谁为高下的问题，常困扰着他们。世贞《书与李于鳞论诗事》记嘉靖三十八年两人的一次谈话，攀龙说：

吾起山东农家，独好为文章，自恨不得一当古作者。既幸与足下相下上，当中原并驱，时一扫万古，是宁独人间世哉！奈何不更评椎所至，而令百岁后傅耳者执柔翰而雌黄其语也。……其不以吾二人更标帜者几希，请为世人实之。

这是说，两人并驱文坛，可以一扫万古。但两人上下之论定，不应由后来人雌黄其间；也不应由当世之人评说。“请为世人实之”，“实”，事实，应该由我们两人根据事实来论定。这话里就包含有与世贞争高下的心态。接着他就把自己与世贞的诗的优劣一一比对，说在各体诗中，只有拟古乐府与绝句不如世贞，其余都比世贞好。他说，自己的诗属神品。世贞的回答是：“子有待也，吾无待也。兹其所以埒欤。子兮雪之月也；吾风之行水

①《报吴明卿》，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一百二十一。

②《李于鳞》，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一百十七。

③《天目先生集》卷十三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。

也。”有待是有所凭依，无待是与道为一，入于化境。他说：“又一日，于鳞因酒，踞谓余曰：‘夫天地偶而物无孤美者，人亦然。孔氏之世，乃不有左丘乎？’”攀龙把自己比为孔子，把世贞比为左丘明。对于这一比喻，世贞非常地不高兴，“余瞪目直视之，不答”^①。攀龙以自己为孔子，更大言说：“微吾竟长夜。”^②没有他李于鳞，就如同没有孔子一样，文坛将永坠长夜。吴国伦在给攀龙的信中说：“元美倚醉数言：‘宇宙内不宜有于鳞。’此其意岂嫌于并立者。”^③“数言”，是不止一次因醉而说出内心的想法，亦“既生瑜，何生亮”之意，要在于谁当领袖的问题。这后七子的关系，在他们结交之初期，还发生过排斥谢榛，中间徐中行与吴国伦争六子的排名先后问题。关于排斥谢榛，涉及诸多问题，既有观念之差异，也有性格与地位之不同。谢为布衣，其余六子诗文中对谢多有鄙薄之言词。总之，此一次文学复古思潮之骨干人物，有强烈争名位之欲望。这或者为此次复古思潮之一动力。或亦可理解为文风之改变，与文坛争霸主之地位，同为此次文学复古思潮之动因。

第二节 文学复古思潮再起之目标(上)

第二次文学复古思潮之目标，就散文而言，与上一次复古思

^①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七十七。

^②《寄元美》：“寥落文章事，相逢白首新。微吾竟长夜，念尔和阳春。把酒千门雪，论交四海人。即今燕市里，击筑好谁亲？”《李攀龙集》卷六，页149。

^③《报李于鳞书》，《甌甌洞稿》卷四十九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。

潮之目标相同,仍然是文必先秦、两汉。

攀龙说他弱冠时就有好古的思想:“余弱冠时,吾党士盖多从殿卿游矣。……余与殿卿读书负郭穷巷,不能视家生产,落落羈身乡校内,佔毕业为之,俊杰相命以好古,多所博外家之语,慕左氏、司马子长文辞,与世枘凿不相入。日月省试有司,伎不能称。”^①这说明他弱冠时因好古而影响了科举考试。殷士儋在为攀龙撰写的墓志中,也提及他的复古思想:

乙巳以疾告归,归则益发愤励志,陈百家言,附而读之,务钩其微,抉其精,取恒人所置不解者,拾之以积学。盖文自西汉以下,诗自天宝以下,若为其毫素污者,辄不忍为也。^②

攀龙在《答冯通府》中,更说:“秦、汉以后无文矣。”^③世贞在《李于鳞先生传》中引攀龙论文语:“以为纪述之文厄于东京,班氏姑其佼佼者耳。不以规矩,不能方圆,拟议成变,日新富有。今夫《尚书》、《庄》、《左氏》、《檀弓》、《考工》、司马,其成言班如也,法则森如也。吾摭其华而裁其衷,琢字成辞,属辞成篇,以求当于古之作者而已。”^④“拟议成变”,是说在学习先秦、两汉时要有所创新。徐中行《重刻李沧溟先生集序》也提及攀龙论创新

①《许母张太孺人序》,《李攀龙集》卷十八,页436—437。

②《李攀龙集》附录二,页685。

③《李攀龙集》卷二十八,页624。

④王世贞《弇州四部稿》卷八十三。

语：“拟议成变，日新富有，能为献吉辈者，乃能不为献吉辈者。”^①他的主张“文必先秦、两汉”，是李梦阳的观点，他是学李梦阳的。但是他认为，要学得好，就要有所创新，与李梦阳不同，这才是真正学李梦阳。至于具体如何学，通过何种之途径，他并没有说。我们在后面将从他的创作实际中作分析。

王世贞(1526—1590)^②论文，推崇先秦、汉以前。《重刻尺牘清裁小序》：

先秦、两汉，质不累藻，华不掩情，盖最称笃古矣。东京宛尔具体……齐、梁而下，大好缠绵，或涉俳偶。^③

质，质实；藻，辞藻。质实而不碍辞藻之表达。辞藻之华美而不碍感情之抒发。就是说，先秦、两汉的文章从思理到文采到情思，都完美结合在一起。在《艺苑卮言》中，他多处论及先秦、两汉文章之特点：

①《天目先生集》卷十三。

②王世贞，字元美，太仓人。举嘉靖二十六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。嘉靖三十年，迁刑部员外郎；三十五年，升山东按察司副使；三十八年，因父王忬被逮下锦衣狱，上书休官；三十九年，王忬被杀，世贞扶丧归家，里居；隆庆二年，起补河南按察司副使，旋迁浙江左参政；三年赴浙江任；四年，转山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，因母丧守制里居；万历元年，除湖广按察使，改广西右布政使，除太仆寺卿；二年，任太仆寺卿，又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督抚郧阳；四年遭弹劾，归家里居；十五年，起补为南京兵部右侍郎；十八年，上疏告休，冬，卒于家。

③《弇州四部稿》卷六十四。

《檀弓》、《考工记》、《孟子》、左氏、《战国策》、司马迁，圣于文者乎！其叙事则化工之肖物。班氏，贤于文者乎！人巧极，天工错。庄生、《列子》、《楞严》、《维摩诘》，鬼神于文者乎！其达见，峡决而河溃也，窈冥变幻而莫知其端倪也。^①

除两部佛经之外，我们看他把秦、汉文章分为圣于文，贤于文与鬼神于文三类，主要着眼点似在其表现特色上。圣者，言其叙事之化工；贤者，言其祖述《史记》，极尽人巧，亦杂以天工。鬼神于文，言其思路开阔，行文奔放而又变化莫测。在这段论述里我们可以见到世贞在文学复古主张上与攀龙的差异。攀龙重视《尚书》、《左氏传》和《史》、《汉》；而世贞则兼重《庄》、《列》与佛典。重视后者，完全是从写法上着眼的。《艺苑卮言》接着说：

孟轲氏，理之辨而经者；庄周氏，理之辨而不经者。^②

经与不经，是从思想之是否属于儒家正统说。而在写作成就上，同样是“理之辨”，长于说理，而思想与儒家异。从这里看，他似更看重表现力。从他的一些言说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唐、宋文、特别是宋文取一种轻视的态度：

①《艺苑卮言》卷三，周维德集校《全明诗话》页1904。

②《全明诗话》页1905。

西京之文实,东京之文弱,犹未离实也。六朝之文浮,离实矣。唐之文庸,犹未离浮也。宋之文陋,离浮矣,愈下矣。元无文。^①

“实”,质实,似指内容之充实与表现之厚重。“弱”,似指其不厚重。但虽不厚重,犹未离质实。“浮”,指文词之华美;文词虽华美,而不注重内容之质实。“庸”,平庸。虽平庸,但尚有六朝文词华美之遗。宋文则并文词之华美亦无之,只剩浅陋。元则无文可言。他的这段论述,把他反唐、宋而主张学秦、汉的文学观表现得很明确。他贬宋文之缘由,是以为宋文浅易。在《古四大家摘言序》中,也提及此一点:

庄生之为辞,洸洋焱忽,权譎万变。列氏时出入而稍加裁。至汉而淮南子出,其言不尽繇一人,其所著载,兼括道术,事情最号总杂,而文最雄。乃左氏则采辑鲁史,而自属以己法,以为《春秋》翼。盖天下之称事辞者宗焉。汉又衰,浸淫而为六代。彼六代者,见以为舍璞而露琢,不知其气益漓而益就衰。昌黎、河东氏之所谓振起六代之衰,欲以追四子而犹未逮也。宋则庐陵、临川、南丰、眉山者稍又变之,彼见以为舍筏而竟津,不知其造益易而益就下。明兴,弘、正间学士先生稍又变之,非先秦、西京弗述。彼见以为溯流而获源,不知其犹堕于蹊也。夫所谓古者,不能据上游以厌群志。而一时轻敏之士,乐于宋之易构而名易猎,群然

^①《全明诗话》页1904。

而趣之。其在嘉靖间，而晋陵为尤甚。^①

这里涉及四个问题，一是对《庄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左传》给了充分的肯定，再一次说明他崇尚秦、汉的视野较广，不局限于儒家。二是他认为唐韩、柳要学庄、列、淮南、左氏四子而没有学到；宋人不学了，而文益流于浅易。三是说前七子溯源学秦、汉了，但是他们“犹堕于蹊”。“蹊”是小路，意谓他们学习的面太窄，所谓学古，“不能据上游以厌群志”。四是批评王慎中、唐顺之他们学宋，是“乐于宋之易构而名易猎”，特别地对王慎中加以批评。从这段论述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宋文看法，他之所以不喜欢宋文，是认为宋文浅易。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推知，对于文章如何写，他崇尚深奥。这也可以看出他们为什么反王慎中、唐顺之，为什么把文章写得那样晦涩难懂的原因。

但是对宋文的态度，世贞晚年有所改变。他论欧阳修之文：“雅浑不及韩，奇峻不及柳，而雅靓亦自胜之。记序之辞，纡徐曲折；碑志之辞，整暇流动，而间于过折处或少力，结束处或无归着。然如此十不一二也。”^②他论曾巩文：“子固有识有学，尤近道理。其辞亦多宏阔遒美。而不免为道理所束，间有阂塞而不畅者，牵缠而不了者，要之为朱氏之滥觞也。”^③他论三苏文：“明允、子瞻，俱善持论，而明允尤雄劲有气力。独其好胜而多骋，不甚晓事体、考故实，而轻为可愕可喜之谈。盖自《战国》中得之。子瞻殊爽朗。其论策沾溉后人甚多。记叙之类顺流而易竟，不

①《弇州四部稿》卷六十八。

②《书欧阳文后》，《读书后》卷三。

③《书曾子固文后》，《读书后》卷三。

若欧阳之舒婉。然中多警俊语。骚赋非古而超然玄著,所以收名甚易。吾尝谓子瞻非浅于经术者。其少之所以不典,则明允之余习;晚之所以不纯,则葱岭之绪言。然而得是二益,亦不小也。子由稍近理,故文彩不能如父兄。晚益近理,故益不如。然而不失为佳子弟也。”^①世贞对宋文看法之转变,亦影响其散文之写作。

世贞还论及秦、汉文写作上的特点问题:

《檀弓》简,《考工记》烦;《檀弓》明,《考工记》奥,各极其妙。

《吕氏春秋》文有绝佳者,有绝不佳者,以非出一手故耳。《淮南鸿烈》虽似错杂,而气法如一,当由刘安手裁。……《韩非子》文甚奇。

西京之流而东也,其王褒之导乎!……东京之衰也,其始自敬通乎!蔡中郎之文弱,力不副见,差去浮耳。王充野人也,其识琐而鄙,其辞散而冗,其旨乖而稚。^②

简,文字简洁;烦,文字繁多;明,明快,明白;奥,深奥。对《檀弓》、《考工记》两书不同的表现特点,他都加以肯定。论《吕氏春秋》与《淮南鸿烈》,他提出了文气流贯问题。出于一人之手,文气流贯,因之行文虽错杂,而“气法如一”。非出一人之手,文气不流贯,因之有佳有不佳。对两汉文的变化,他也有细微的

^①《书三苏文后》,《读书后》卷三。

^②《全明诗话》页1905。